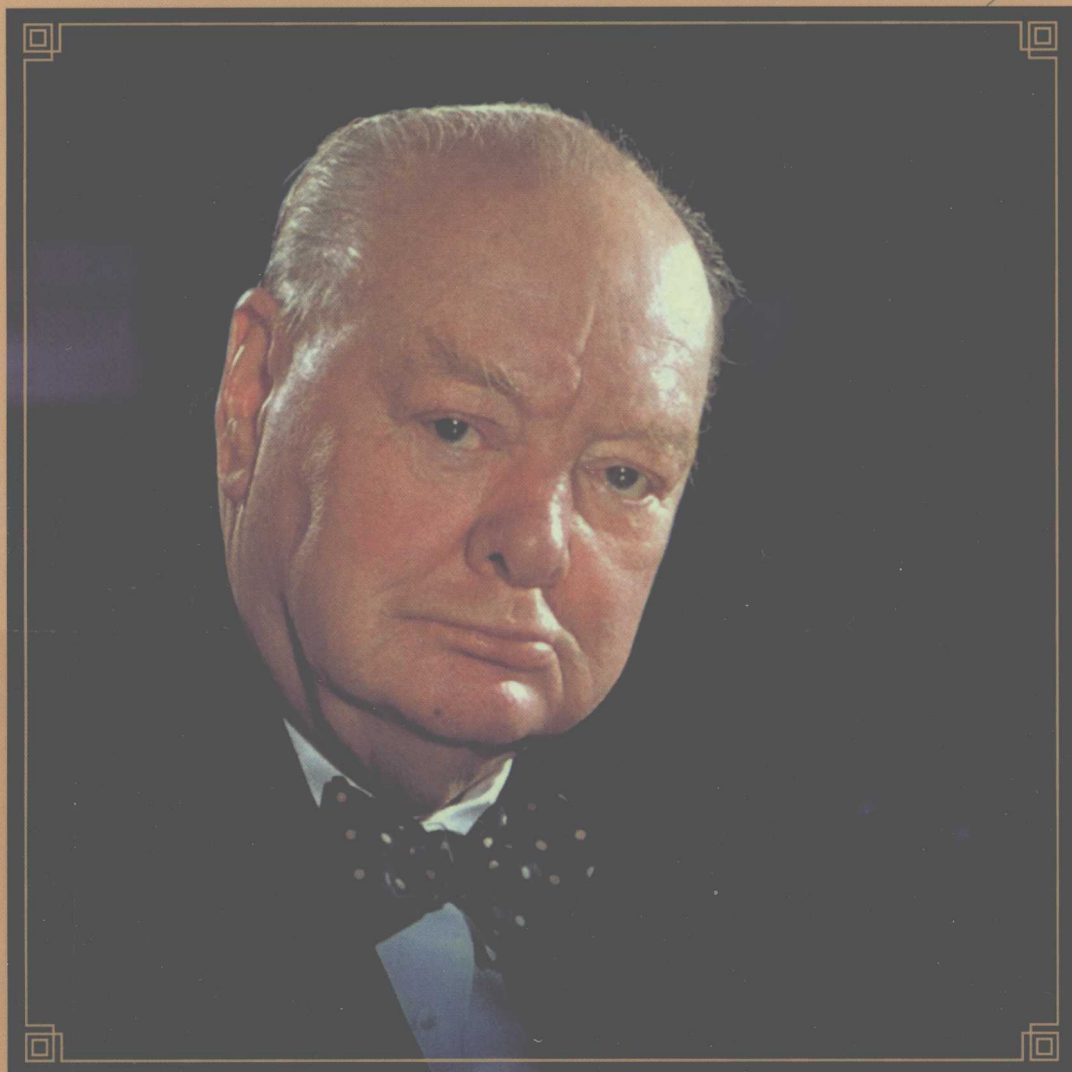


丘吉尔

私人医生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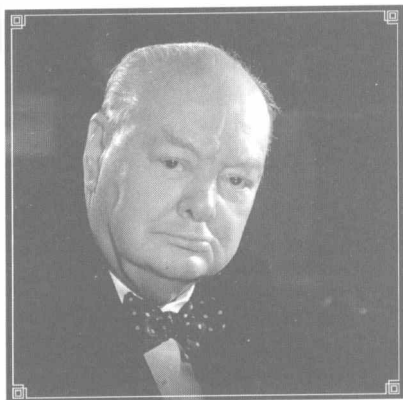
[英]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著

袁履庄 谭震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35.61/103

2008



丘吉尔 私人医生的日记

[英]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著

袁履庄 谭震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英)威尔森(Wilson, C. M.)
著:袁履庄,谭震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书名原文: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5 ~ 60

ISBN 978 - 7 - 208 - 07699 - 0

I. 丘... II. ①威... ②袁... ③谭... III. 丘吉尔, W. L. S.
(1874 ~ 1965) — 生平事迹 IV. K835.61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703 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封面装帧 甘晓培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5 - 60 by LORD MORA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BY CONSTABLE,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Copyright: © 1966, 2006 LORD MOR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

[英]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 著

袁履庄 谭震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5 插页 3 字数 404,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699 - 0/K · 1421

定价 40.00 元

书 评

“一部有关丘吉尔的宝典……一本个人回忆录，观察入微，笔触细腻，感人至深。”

《出版周刊》

“最使读者感兴趣的是，作者下笔之处，一再流露出莫兰勋爵对温斯顿爵士的一片忠诚。”

西瑞尔·康努利《星期日泰晤士报》

“发人深省、富有洞察力又极具人情味的回忆……在所有关于丘吉尔的书籍中，我没有读到过哪一本，在轻描淡写又直言不讳、颇有独到见地方面能与之媲美的……他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既不溢美，也不饰非……确乎引人入胜。关于丘吉尔的其他书籍你可以不读，此书非读不可。”

1

约翰·巴克汉姆《周六评论辛迪加》

“这是处于心理不设防状态的穿着拖鞋的丘吉尔。如果伟大形象只在公众场合显露，那我们从历史长河中了解到的只能是一鳞半爪！”

乔治·麦尔柯姆·汤姆森《每日快报》

“丘吉尔作为一个凡人，既有坚强一面，有时又难免脆弱，其详细故事由当事人的感觉敏锐又知识渊博的朝夕相处的伙伴娓娓道来，世人当引为幸事。”

赫伯特·布莱克《波士顿环球报》

“对温斯顿其人最精彩的描述，有长处，也有短处，瑕瑜互见。”

爱德华·威克斯《大西洋》

“意志被证明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可贵的贡献。”

《英国医学杂志》

“这是一本高质量的书，读者兴趣不减，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宝贵见证。”

《每日快报》

“莫兰勋爵极其直率的颇具说服力的篇章毫无疑问将改变许多读者对某些战时领导人的看法，但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只会因莫兰的秉笔直书而愈显高大……丘吉尔精神之伟大跃然纸上……”

亨利·C. 沃尔芙《芝加哥论坛报》

“欢快的文学风格……由完美的事件亲历者作出的颇具私密性的宝贵实录。”

凯瑟琳·高斯·杰克逊《竖琴师》

2

“以其对历史的贡献彰显其重要性……它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近代一个伟大人物的了解。”

查尔斯·彼得利埃爵士《伦敦新闻画报》

“幽默，儒雅，对在紧要关头能鼓动士兵的那种人格力量的力透纸背的分析……对作为他护理对象的这个人的热爱和同情——凡此种种，均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巴利埃·皮特《书社》

“不管写皮特父子，还是写福克斯、伯克或沃尔浦尔的书，都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特伦斯·德·凡尔·怀特《爱尔兰时报》

“莫兰勋爵尊重历史，他所记录的和首相共同度过的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

的岁月是对当年历史的一个贡献……”

《图书馆杂志》

“一种特具私密性的描述……取自历史舞台侧面的故事。”

米勒斯·A. 史密斯《美联社》

“对温斯顿·丘吉尔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不可或缺的引人入胜的回忆。”

约翰·M. 布鲁姆, 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

“莫兰对于1945年以后岁月的深刻领悟很有价值……对人物性格的剖析鞭辟入里, 即便时而有那么几分尖刻。”

戴维·雷诺兹教授《伦敦书评》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佳作, 有意了解历史原貌以及一位力主时代沉浮的伟人生平的人士不可不读。其报道之直白或将招致非议。但恰恰是这种毫不掩饰的文风, 连同作者以其真知灼见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秉笔直书的良好素质, 才赋予此书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爱莉丝·蒂克松·邦德《波士顿星期日先驱报》

“该书对丘吉尔的私密性描述无出其右……显而易见, 作为一流的医学专家, 莫兰勋爵极具睿智, 他不仅从医学角度, 也能从其他不同视角观察复杂的丘吉尔。他在政治上十分老练、成熟。即便在高层权力机构, 他也有稳固的地位, 因而他并不畏惧身边这位官高爵显的病人。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能书会写。于是乎, 他的日记既有厚度又不乏含金量, 且极具可读性。”

克利富顿·法蒂曼《当月书刊俱乐部新闻》

鸣 谢

我得感谢女王陛下允许我发表她给丘吉尔先生的信。感谢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迈克斯·艾特肯先生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信件。

我希望能表达对理查德·丘奇先生的谢意，感谢他帮助把此书整理成册。我要感谢伯明翰大学的特伦斯·斯宾塞教授，我在写此书时，承蒙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每当我产生疑问时，都能向他寻求帮助。

美国波士顿休顿米弗林公司的亨利·劳林先生紧随故事的进展，所表现出来的持续的兴趣令我鼓舞。克莱格·怀尔利先生通读了全文，他的认真评价使我获益匪浅。我也非常幸运地得到我的伦敦出版商，康斯特布尔公司的本·格拉茨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当面向我指正，每每使我有举重若轻之感。在此我还要称道丹尼斯·汉密尔顿先生的热情鼓励。

我得感谢已故的犹娜·艾利斯-弗莫教授，以及穆丽尔·布拉德布鲁克教授，感谢她们的批评和忠告。我还倚重我儿子约翰·威尔森的坦率批评，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帮助我解决了难题。

我要感谢我妻子和玛丽安·迪恩小姐，她们付出了时间和心血校订样书。

在我搁笔时，希望能确认我已如实地报道了那些与我谈起丘吉尔的人。我相信我在核对那些谈话时，没有遗忘任何人。

莫兰勋爵

经过几年的筹备,《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于1966年,即丘吉尔谢世一年多之后出版。这本书毫不护短地详细描述了一个“最伟大的活生生的英国人”。即便是最快的浏览一遍有关丘吉尔的许多书籍中的一小部分,也足以表明本书的重要性。在马丁·吉尔伯特的官方传记的战后卷中,莫兰一人便占了索引的整整一栏。^①罗伊·詹金斯在许多方面对莫兰持批评态度,但同时又利用他的报道来了解丘吉尔老去的岁月。^②最近由约翰·拉姆斯顿和大卫·雷诺尔兹写的研究温斯顿传奇的书也深入钻研了莫兰的著作。^③莫兰的重要性很明显:虽然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的故事被一再传颂,作为凡人的丘吉尔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莫兰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凡人丘吉尔,既为他唱赞歌,又不刻意护短,文过饰非,的确堪称最佳秘述。相对于巴巴的官方传记,它肯定更富有人性色彩。而且丘吉尔的许多工作习惯也几乎成了传奇——他的睡眠模式,他使用安非他明——这些我们都是通过莫兰才知道的。

莫兰生于1882年11月,全名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他于1943年被册封为贵族,1941年至1950年任皇家医学院院长。莫兰是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于1940年成为丘吉尔的保健医生,直到丘吉尔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追随其左右,亲眼目睹他度过一系列的医疗危机:从战争时期的肺炎和心脏病发作,到1949年起的一连串令他日趋衰弱的中风。莫兰描写战争时期的书《丘吉尔在战争中,1940—1945》于2002年由康斯塔布尔和罗宾森重新出版。我在2005年夏天接受委托,

① 马丁·S. 吉尔伯特,《温斯顿·S. 丘吉尔,1945—1965:“永不绝望”》,(伦敦:明维拉,1990。)

② 罗伊·詹金斯,《丘吉尔》,(伦敦:潘书局,2002),第862—912页。

③ 约翰·拉姆斯顿,《世纪伟人:温斯顿·丘吉尔和他1945年以后的传奇经历》,(伦敦:哈泼柯林斯,2002);大卫·雷诺尔兹,《掌握历史: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与写作》,(伦敦:企鹅,2005)

帮助编辑一本原著的战后部分,引用了莫兰所保存的与原著出版时依然活着的人有关的档案中从未披露过的材料。它在展示丘吉尔病人的形象方面,比战时部分着墨更多。它纪实性地描述了丘吉尔确实是在为生存而奋斗。并且,它也包含莫兰的攻击者认为由于本书的出版而引起公众争议的更多令人不快的材料:丘吉尔的频频沮丧、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成为他 1951—1954 年第二个首相任期的慵懒的特征。莫兰的叙述激起一群其他知情人谱写了一批有关丘吉尔在工作时的颂歌。《今天的行动》是由历史学家约翰·韦勒-贝内特编辑的,它包括了本书中出现的人物写的文章,如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和内阁秘书诺曼·布鲁克爵士。结果只是昙花一现,多半已被公众遗忘。而莫兰的作品却戏剧性地塑造了历史记忆中的丘吉尔,它被历史学家用来作为研究丘吉尔生活的主要来源。

然而,这本书自从出版以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历史学家中间也会继续产生同样的争议。1966 年,由于莫兰明显藐视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而引起了分裂医学界的喧嚣,《柳叶刀》攻击他,而《英国医学学报》竭力为莫兰的名声辩护。英国医学协会对那时已上了年纪的莫兰提出责难,但还是顶着压力,拒绝开除他。莫兰的儿子,如今的莫兰勋爵,在对争议清晰、明智的说明中解释说,莫兰的“自我辩护是,在伟大历史人物逝世后,写关于他的事是应该被允许的,更何况他也告诉过丘吉尔他打算做什么”。^①对本书的攻击由丘吉尔的家人打头阵,他们反对描写丘吉尔的私生活。但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中,西里尔·科诺利注意到,“莫兰勋爵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反映了他对丘吉尔的忠诚”,该书评最后被印在环球书局的简装本(1968 年)的背后。

所有读者都能明显地发现莫兰崇拜丘吉尔。环球书局其实正是抓住道德争议作为促销手段。在科诺利的书评中也留出篇幅刊登了伦道夫·丘吉尔给《泰晤士报》的信的节选以及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样处

^① 莫兰勋爵,《丘吉尔在战争中,1940—1945》,莫兰勋爵的《前言》,(伦敦:罗宾森,2002),第 21—22 页。

理,连同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对最具争议的段落的连载,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莫兰的书通篇是对丘吉尔生活方式的披露,即对他人生最后几年的详细的、引人注目的、人性化的叙述。这个道德争议如何与历史争议相联系,人们可以通过印在简装本封面上的生动语言来获悉:“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的日记是一部杰作——许多人谴责它严重地背叛了病人的信任”。正是“严重背叛”这四个字成了卖点,就像书的“日记”体受人青睐一样。作为一个知情人的叙述,日记(与回忆录相对)传达了亲密、诚实、深刻的印象。

在历史学家看来,问题在于“日记”性质的书是一个复杂写作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首次由莫兰的传记作家理查德·洛维尔予以解释。^①检查伦敦威尔康姆图书馆保存的莫兰的文件,人们可以发现,莫兰经常在笔记本上记下和丘吉尔在一起时的想法和商谈的内容。有些有日期,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有。并且,在这些笔记本里,有着更多思考的部分,包括显然是事情过后几个月写下的对丘吉尔的观察——极其细微的观察。最后,有些内容便构成了展示丘吉尔个人各个方面的文章。所有这三部分——完全同时代的、接近同时代的、散文素材——交织在这些笔记本里。经常,同样的素材在每个部分都重复使用。此外,莫兰还经常把他的想法写在分散的纸片上,或写在信封的反面。总之,这些手稿不像是世界公认的日记,而像是莫兰一直打算写的有关丘吉尔的书的笔记,处于经常变动、修改的状态。这些笔记被打印成日记的形式,第一稿包含了一些可辨认的、标注日期的笔记本上的记载,还结合了一些其他材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对最初的这份打印稿进行了大量、经常的修改。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并不是其中所包含的一切都能发表。第二个原因是体裁上的:日记经过改写,提升了总体质量,有些日记被删除、抽调、重新布局,有些记载被列入其他篇目。最常见的是,一则日记包括了莫兰两次和丘吉尔在一起的叙述,这样的内容就会被一分为二,增添一个新的日期,而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某一

^① 理查德·洛维尔,《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传》,(伦敦:皇家医疗服务学会,1992)

日记是莫兰在当天晚上写的。但是除了日期有点偏差,似乎没有证据表明莫兰的日记里有谬误。

这被确认为莫兰的工作方式,他的第一部作品《勇气的剖析》就是如此写就的。那是一本杰出的书,是关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步兵团当军医的经历(他在索姆荣获了军功十字勋章),检验了人类面对现代战争一切恐怖时的极限。那本书也有日记和散文的“双重性质”(虽然公平地说,两者之间的区别更明显)。持续修改本书的一个结果,就是驱散“日记”记载中的一些散文材料,以期避免对本书性质制造一种误导的印象。

但是,讨论本书的内容比讨论它的构成更有趣。本书虽然包含了1945年到1960年的日记,但主要还是集中在1951—1955年丘吉尔的第二届政府时期。这个时期历史上不被重视。正如彼得·亨纳西所说,丘吉尔和平时期的政府有故意重新创造战争年代的感觉。旧时的盟友被召集到新、旧职位上:乔克·科尔维尔、切维尔勋爵、普格·伊斯梅、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勋爵都恢复了旧时的颜色,只有波特尔勋爵抵制了召唤。^①这导致这届被称为“惯犯”,或“印度之夏”的首相任期。^②研究丘吉尔的学者倾向于忽视1951—1955年,这种倾向由于罗伊·詹金斯描写丘吉尔“明显的不适合任职”^③而得到加强。读者从本书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印象。莫兰展示了一个明显进入暮年的丘吉尔,拼命地抓住职位不肯放手。显然,丘吉尔生病时,莫兰大部分时间和他在一起,或者如约翰·兰斯顿所注意到的,莫兰自以为如此。^④但是,正如亨纳西所认为的,“人们应该小心,不要过分描写老勇士在最后的首相任期里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持执照的药罐子”。^⑤这里的丘吉尔常常表现出状态极好,不管是在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议论当前的同事或对手,或

① 彼得·亨纳西,《首相:1945年后的职位和职位拥有者》(伦敦:企鹅,2001),第181—182页。

② 这两个词语是分别由罗伊·詹金斯和安东尼·塞尔顿杜撰出来的。见彼得·亨纳西《首相》,第179页。

③ 詹金斯,《丘吉尔》,第845页。

④ 兰斯顿,《世纪伟人》,第534页。

⑤ 亨纳西,《首相》,第181页。

谈论他的阅读习惯,或回忆战争的片断时,闪光的对话、犀利的话语、精炼的句子常常脱口而出。经典的丘吉尔学家的文章对本书痛加挞伐。

詹金斯在概括第二届丘吉尔政府时认为,“除了从相互用氢弹屠杀毁灭世界中拯救人类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支配他的思想以外,他努力奋斗,志在延长自己的任职时间成了比任何其他政策问题都更重要的头等大事。”^①事实上,丘吉尔坚持不肯离任的惟一理由,就是他决心要结束冷战。这两件值得关注的事:冷战和继续留在台上的愿望,以及对他疾病的叙述,是莫兰这本书的主题,也是惟一把这些线索充分交织在一起的第一手报道。

人们阅读本书,很快就能意识到这些主题中的第一个,即1951—1955年这届丘吉尔政府受到冷战的支配。莫兰和丘吉尔待在一起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他们到美国去的旅行上,同时丘吉尔试图组织和艾森豪威尔以及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的峰会的话题大量出现在丘吉尔的谈话中。这种对个人外交的追求在1954年7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船上,丘吉尔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见1954年7月2日的日记)。由于没有经过内阁的同意,在他回国的路上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丘吉尔大力推动结束冷战,在某些人看来与他1920年代所赢得的、1946年在福尔顿进一步提升的反共名声不一致,但这是由对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的真正恐惧所引起的。正是由于丘吉尔在1954年意识到了氢弹的威力,才刺激他渴望在那一年与美国人和俄国人会面(例如,1954年4月8日的日记:“当然,他们会说我可能受到冷落。我不在乎。如果你想拯救世界,受到冷遇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正是氢弹导致了丘吉尔在1945年以后的岁月里的主要的个人转变。随之,引入第二个主题,他的带病之身。

丘吉尔首相任期的一个关键时刻是议会在1954年4月5日就氢弹进行辩论。艾德礼那时还是工党的领袖,发表了丘吉尔自称为一场

^① 詹金斯,《丘吉尔》,第846页。

“深思熟虑、令人鼓舞的演讲”，虽然丘吉尔开始进行（用莫兰的话说）“高度争论”，但随后，“这时，整个议会寂静无声，似乎因世界所面临的悲惨问题而麻木了……一场靠比分获胜的战斗，这使保守党和社会党都深感震惊”。简单地说，他攻击之前的工党政府放弃了英国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否决权，那是他在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上秘密商定的。但是，它没有被用来作为反击的利器（事实上是丘吉尔处理失当），而是演变成了党派腔调，因此与这个场合格格不入，从而引起了群情哗然。当议会朝他狂喊“退出”、“辞职”时，莫兰在座看着，非常担心：

我越来越担忧事件的转折。我惊叹这么个年已八旬的老人，中风只恢复了一半，竟可以在喧嚣和混乱中，在演讲席上站整整一个小时，面对深深的敌意，兀自岿然不动。他把事情搞糟了。尽管如此，我坐在那里，看着他，却帮不上忙，这使我感到自己可怜巴巴的。我不知道这次议会风波在党内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会不会再次中风？这时，似乎议会发泄完了，毒汁也已释放殆尽，“辞职”、“退出”的叫嚣平息下去了，趁着暂时的平静，首相不着边际地继续讲下去。他们安静地让他讲完，很奇怪，我似乎平添了一种恐惧感。他语音中的抑扬顿挫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老人颤抖尖细的声音；不管怎样，他必须完成预定的讲话才能坐下。他急促而含糊地说着，似乎惟一的目的是尽快结束发言。

这时，温斯顿在辩论中的糟糕的表现正好作为他的体力衰退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凭着这一点，许多人质疑他继续留任的能力。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丘吉尔的失败是由于两件事。首先，辩论的‘超党派’性质和无情揭露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第二，他挽回的能力已经失去……他被‘从高位上击落’”^①《泰晤士报》的社论（麦克米伦把它称为“难堪的傲慢”）^②，认为“首相的善于因势利导是他在下院最大的优势之一，昨天这种优势却可悲地弃他而去。”^③

①② 彼得·卡特劳尔(编)，《麦克米伦日记：内阁岁月 1950—1957》（伦敦：麦克米伦，2003），第304—305页，1954年4月6日的日记。

③ “海湾”，《泰晤士报》1954年4月6日。

然而,正如莫兰的日记告诉我们的,这次演讲是一个从严重中风中康复的人作出的:那场疾病、他的康复以及莫兰的插手,组成了本书的基本部分。丘吉尔在1953年6月24日发生了一次中风(他1949年在蒙特卡罗也发作过一次),这影响了他的演讲、行动以及集中精力的能力。从那时起,很明显,除非首相能够在10月10日在马尔门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讲,否则他就完了。这四个月中,丘吉尔想干下去的决心和莫兰对他的生命的担心交织在一起,痛苦地让人揪心。本书还详细描述了如何采取行动,对丘吉尔的情况进行保密。这是莫兰全身心投入的事。他极度害怕公众知晓丘吉尔中风,在1953年7月11日的日记中,他解释了原因:

假设他固执己见,现在就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每个人都会知道,他得了中风。他认为这没关系,可我相信这有很大的关系。当人们听说某人得了中风,他们会觉得他脑子里出了毛病,导致了瘫痪和思维的退化。那人可能继续活上一段时间,但已不能做正儿八经的事情了。首相写信给艾克,说他得了中风,完全瘫痪了,而且他的语言也受到了影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描述得如此详尽,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与他理论,试图说服他不要谈到中风和瘫痪,可他却不断重复“瘫痪”这个词。

正是在这种印象下,莫兰试图防患于未然,并且非常成功。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在拿丘吉尔的健康公告进行“赌博”。在6月26日的日记中,莫兰曾对此作了详细描述,原先由莫兰和罗素·布莱恩爵士写的公告被萨利斯布瑞勋爵和R. A. 巴特勒作了修改,以避免所有谈到“脑部血液循环受到干扰”的话题,而是用疲劳作为借口。这份公告消除了中风的传言,但是,如果他在1953年夏天去世,公告将引起巨大争议。

虽然丘吉尔在1953年10月党的大会上的讲话使他能够继续工作到1955年4月,虽然他在1954年4月下院的辩论中遭到了失败,但是不把1953年6月的中风看作是一个“健康”和“不健康”的丘吉尔之间的绝对界线,是很重要的。在1953年之前,私底下就有对丘吉尔工作能力的怀疑了,第二次中风之后,有几天他的精力几乎完全恢复了(见

1953年8月25日的日记)。但是,毫无疑问丘吉尔在1953年之后总体来说能力较差,不大愿意再担当起首相艰巨的工作。例如,在他1949年8月在蒙特卡罗第一次中风后,在一则现在才全部发表的日记中,莫兰写道,1945年的选举,紧接在战争岁月的压力之后,对他没好处:

旧日的虚荣,从他的伤口中涌出,他往日的自信已随风逝去。然而,时过境迁,我想我的担心已被遗忘大半;他似乎恢复了对生活的兴趣,重现活力,好像把过去抛在了脑后。但我还是感觉到他已经步入了老年。岁月的印痕毕竟是无法掩饰的。尽管如此,他的中风仍然使我大感意外(1949年8月25日)。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关心他的健康的例子是,莫兰和保守党内阁的高级成员在1952年2月丘吉尔受到一次小的脑部血液循环干扰后,曾说服他减轻工作。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莫兰决定(1952年2月22日的日记):

如果首相安全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在预算案后,我必须和他正面交锋,竭力说服他要理智些。他不会听任何人的,当然我也不能高估我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他的医生,这是我的工作。我想我了解他的思想转变,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不喜欢做这样的事,但这是我惟一能为他做的。

在同一天,莫兰与乔克·科尔维尔和萨利斯布瑞勋爵有过一次不寻常的会面,谈论减轻丘吉尔的工作,在谈话中,科尔维尔说:“我憎恶不忠,但首相似乎不在工作。一份五页的文件必须缩减到一个段落呈交给他,这样许多争论的要点都丢失了。”解决办法是激进的:把丘吉尔送到上议院去当首相。萨利斯布瑞“很有把握,温斯顿可以到上议院去,仍然当首相”。莫兰怀疑那是否能行,果不其然,最终毫无结果。然而,这一段记载清楚表明,即使丘吉尔重新当首相只有四个月,高级同僚和官员们相信,他已不能完全胜任担当首相的重任。阅读本书,了解了大量关于安眠药、安非他明,甚至丘吉尔发表一次演讲都需要十足的意志的情况后,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丘吉尔永远不应该二度担任首相。然而莫兰自己毫不怀疑,他对国家有用,相信“不受欢迎的决定得

作出……他会作出”。而且,莫兰显然很关心他的病人,他常常提到,如果丘吉尔被迫退休,他相信丘吉尔在退休后寿命不会长。

这次秘密与科尔维尔和萨利斯布瑞的会面是多次劝说丘吉尔放慢节奏,以及后来劝说他辞职中的第一次。这是本书的第三大主题。1953年的下半年,整个1954年,以及1955年初,直到丘吉尔最终在1955年4月辞职,他离任的前景在保守党圈子内部的政治谈论中占支配地位。本书提供了丘吉尔许多知情者的观点。一个典型的例子(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来自客观的、受到高度尊重的内阁秘书)是诺曼·布鲁克爵士在1954年4月1日对莫兰的议论,就在氢弹辩论崩溃之前,他认为,如果丘吉尔不在那年的7月辞职,将会发生一次党内“争吵”。“他们正考虑在1955年秋季举行大选。如果首相在7月退出,那么在选举前,安东尼几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需要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年轻人。”

另一篇以前没发表过的日记展示了对丘吉尔超级忠诚的女婿克里斯托夫·索姆斯对丘吉尔所表达关心(1954年4月8日,氢弹辩论之后):“克里斯托夫确信,过去两个月里,他看着温斯顿在日渐衰老。‘他知道他已无法胜任,必须退出。’克里斯托夫认为,圣灵降临周是他离开的最佳时间。‘你知道,查尔斯,你是惟一可以说服他离开的人。’”但是,尽管有所谓的艾登的发脾气,丘吉尔依然滞留不走,部分原因是他越来越对艾登做好工作的能力感到不安。最新发表的一些材料表明,丘吉尔内部圈子的一些成员贬低艾登。例如,丘吉尔的一位私人秘书安东尼·蒙太古·布朗恩告诉莫兰:“如果艾登真的当了首相,我恐怕他身边聚集的人只会随声附和他的意见。他就喜欢那样。”(1954年8月6日)他还告诉莫兰(1954年10月5日):“你在唐宁街10号工作,是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工作”,但为艾登工作,“你是为一个神经质的人工作”。莫兰自己的观点是:“安东尼要么和蔼可亲,要么怒气冲冲,他不可能处于静态,或保持常态。”(1954年7月30日)

另外,原版中删去的材料,本版新加了进去,因为它的主题仍然有活力,如莫兰对普格·伊斯梅的评论。在1951年12月30日的日记

中,他记录了“当首相不经意间朝他一瞥时,他的脸上马上堆起了皱纹,就像一条哈巴狗——这就是伊斯梅勋爵的绰号的来源(英语 pug 可作哈巴狗解)。但如果你更仔细地观察,会发现那双眼睛里没有欢乐,满是冷淡与警觉”。在1953年12月2日的日记中,莫兰详细记录了出席百慕大会议的旅行,其中有一段新的赞扬艾登的话语:“他对人的判断很有洞察力”。

安东尼不像温斯顿,他可以看穿外表后面的东西。他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被普格的小伎俩所蒙蔽。安东尼微笑着说,普格四处说他必须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辞职,但是,“他却终身在那里工作。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挤出去。他四处散布说自己脱不开身去百慕大,随后他又上下活动,竭力去获得邀请。但这不会改变我对普格的好感”。

另外一个新的故事,是莫兰叙述哈罗德·麦克米伦试图说服丘吉尔退休(1955年1月9日)。原书中存在一个经过重大修改的版本。莫兰与麦克米伦一起吃饭,麦克米伦转弯抹角提出了他的观点:“你知道,莫兰,温斯顿应该辞职……他再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些复杂的事务。他无法做好首相该做的事情。”莫兰感到震惊,编辑过的日记的最后一段对此是这样描述的:

这一切根本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最近一直把哈罗德看做是老头的一个盟友。以前保守党的几位首相被宫廷革命推翻过。自从首相意识到某种类似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后,他便频频向他的支持者咨询——向哈罗德咨询的次数要比其他任何人多。现在,虽然哈罗德依然忠于老头,但他觉得老头已不再能胜任工作了。

这段记载带给人们的印象是,麦克米伦原则上相信,他虽然“忠于老头”,但是丘吉尔应该离职。在原来的手稿中,和在这个版本中,最后一句话是没有的。而日记里添加了以下这段:

也许简·波特尔是对的,她认为麦克米伦喜欢站在胜利者一边,他肯定看到安东尼的时代来临了,温斯顿的离开只是为时几个月的时间问题。她不喜欢哈罗德,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对首相不忠